

「美亞文件」座談會

國際關係研究所學術座談會紀錄

中華民國國際關係研究所於民國五十九年三月十七日上午九時至十二時，在台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七樓會議室，舉行第三十九次學術座談會，以「美亞文件」為題，此次座談會由該所主任吳俊才教授主持，應邀出席的有（以簽名為序）：郭乾輝、谷正鼎、陳紹賢、余紀忠、吳俊才、鄧公玄、羅石圓、陳元、雷崧生、朱少先、札奇斯欽、尹慶耀、張棟材、馮達、石永貴、張文蔚、鈕先銘、趙惠謨、梁和鈞、孫桂籍等二十餘人。中央社、中國電視公司、中廣公司、正聲公司均派記者出席採訪。茲按當日發言先後，將其要點刊載於後，供讀者諸君參考。

主席報告：

今天是國際關係研究所第卅九次的學術座談會，本人代表本所歡迎各位出席參加，我們所要討論的題目是：本年二月份美國參議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所公佈的「美亞文件」，在此文件公佈時期，美國方面公佈了另兩個文件，一個是一九七一年的美國國防計劃及預算，一個是尼克森的外交和平新戰略，這三個文件需要做深入的研究，才能對美國外交政策，和美國的遠東策略有一個更清楚的瞭解。關於美亞文件的本身，要追溯到一九四〇到一九四五，就是在二次大戰期中，美國國務院一部份低級級外交人員、新聞記者等，他們如何有組織的、有計劃的，在進行一個幕後的重要活動。這個活動，對我們的國家有很大很大的影響，不僅使中國大陸淪陷在中共的手裏，同時帶來了大陸淪陷以後，遠東地區整個的動亂，一直到今天，也大大的影響了中國與美國的關係和美國國內的安全。此文件的主編人，達拉斯大學歷史系主任柯貝克教授這兩天就要到台北來，下個星期本所準備請他做一個專題講演，討論有關的中美的關係。我們今天所要討論的是，此文件所代表的意義，以及此文件所帶來的若干發展以及它的影響。在各位發言之前，先請本所國際組雷崧生教授，做一個很簡要的說明，以後再請各位發言。現在請雷崧生教授為我們報告。

「美亞文件」之由來

雷崧生

壹

所謂「美亞文件」，嚴格言之，應稱爲「美亞雜誌之文件」。美亞雜誌於一九三七年創刊，一九四五年停版。最高銷數僅一千七百分。每年虧損頗大。美共富豪費魯特 Frederick Vanderbilt Field 嘗予以經濟上之補助。編輯所設於紐約市第五大道二二五號。

一九四五年六月六日，聯邦調查局奉命搜查美亞雜誌之編輯所，與其有關人物之住宅，獲得國務院、陸軍部與其他機關之文件一千七百餘種，大都印有「高度秘密」、「秘密」、「機要」與「限閱」等等字樣。被捕疑犯六名。此即爲轟動一時之美亞雜誌案。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間，司法部應上議院司法委員會之請，先後將上述文件之一千二百餘種，轉送該委員會之國內安全小組。該小組因委託達拉斯大學教授柯貝克 Antony Kubek 予以整理與分析。柯氏以兩載之精力，選出其中三百十五種，編爲「美亞雜誌之文件——中國災難之一線索」，並撰寫六萬字之導論，以弁其首。去年該小組決議予以印行。今年二月十五日，始公開發售，分爲兩冊，連同自次、附錄與索引等，不下兩千餘頁。

貳

一九四五年年初，美國情報機構即開始注意美亞雜誌。該雜誌所登載之若干文章，與戰略情報處之

秘密報告，竟相雷同，是爲該雜誌引起懷疑之起點。三月十一日，該處派員於深夜搜查該雜誌之編輯所，發現「高度秘密」之文件甚多。遲至六月六日，始有聯邦調查局正式搜查之舉。當時被捕者六名如下：

美亞雜誌編輯傑非 Philip Jacol Jaffe，俄裔，哥倫比亞大學出身，記者，一九三四年與一九三七年，兩度來華，前赴共區與延安，與美共主席頗有往還，以售賣賀卡致富。

副編輯米契爾 Kate Louise Mitchell 女士，曾以太平洋學會會員之身分，訪問蘇俄，著有關於印度之書籍數種。

撰稿人蓋因 Mark Julius gavn，俄裔，生於哈爾濱，曾在海參崴就讀，哥倫比亞大學出身，記者。

投稿人羅斯 Andrew Roth，匈裔，哥倫比亞大學出身，論文爲「中國之勞工與民族主義」，通日文，服務於太平洋學會。戰時，以海軍上尉之身分，擔任海軍部與國務院之聯繫工作。

職業外交官謝偉思 John Stewart Service，生於成都，先後在昆明、北平、上海、蘭州與重慶等館服務。戰時借調在史迪威 Joseph W. Stilwell 部下工作。謝氏與傑非之相識，係羅斯介紹。

「遠東專家」拉森 Emmanuel Aiguad Larsen，丹裔，曾在東北、天津與北平等處，服務於我國郵局，後在芝加哥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美國國會圖書館與海軍情報局工作。戰時，以遠東

專家之身分，入國務院。拉氏與傑非之相識，亦係羅斯介紹。

上述嫌犯由司法部以「串通違反間諜法」之罪名，向華盛頓陪審團予以檢舉。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日，陪審團投票結果：米契爾、蓋因與謝偉思，不予起訴。九月二十五日與十一月二日，傑非與拉森，改以「非法取得政府文件罪」，分別罰鍰二千五百元與五百元。翌年二月十三日，羅斯亦予開釋。

美亞雜誌案草草了結，頗引起各界人士之不滿。國會一再予以調查，亦未克澄清該案之有關各點。「美亞雜誌之文件」，可謂爲此種調查之唯一收穫。

上述六人中，最值得注意者，自爲謝偉思。「美亞雜誌之文件」三百十五種內，出自於謝氏手筆者，約百餘件。其所撰寫之報告，分發頗廣，時或經由霍布金斯 Harry Hopkins 而逕達羅斯福總統。

謝氏於一九四一年奉派爲美國駐華使館之三等祕書，駐在重慶，與周恩來等多所聯繫。一九四二年，謝氏遊歷西北五省。一九四三年，謝氏轉調在史迪威部下工作，其地位更爲特殊，竟建議美國派員駐在延安。一九四四年七月間，謝氏參加美國陸軍考察組，勾留延安三閱月（七月二十二日至十月二十三日），發出報告五十餘篇，均爲一面倒之祖共報導。一九四五年三月間，魏德邁 Albert C. Wedemeyer 將軍已禁止與延安來往，而謝氏竟向總部借機，擅自飛往延安，復作四星期之勾留（三月九日至四月四日），發出報告十九篇，論調益爲變

本加厲。赫爾利 Patrick J. Hurley 大使至為震怒，親訪陸軍部長史汀生 Henry L. Stimson 予以調回。謝氏於四月十二日抵美，旋即捲入美亞雜誌案中，已見上文第一段。

謝氏之忠貞問題，曾在國務院中作六次之調查

，每次均獲得「無可致疑」之決定。遲至一九五一年底，國務院始免去謝氏之職，一九五七年九月，以六年前之命令，有程序上的疵瑕，謝氏得復返國務院服務，一九六〇年退休。謝氏現在柏克萊加州大學中國研究所圖書館任職。

同時期之美國職業外交官中，與謝氏沆瀣一氣者，尚有戴維斯 John Paton Davies、艾默生 John K. Emerson、登魯 Raymond P. Ludden 與范宣德 John Carter Vincent 等，「美亞雜誌」文件，亦屢屢提及，茲不贅述。

梁和鈞先生：

美亞案件有國際共黨背景

自由世界應引為前車之鑒

美亞案件的原委、分析和影響，諸位說的很多，很對，我也有一文在中國時報發表，不必在此多贅，我現想說的只有下列三點：

(一)美亞案件不是孤立的，他的背面有國際共黨的組織，有左傾同志社團，有文化學人，有電影明星，也有廣播電視，就是立法界司法界行政界也有甘為奔走呼號的朋友，所以這案件的起落，就可看出國際共產黨在美國社會各基層勢力的反映。

(二)美亞案中的謝偉思雖然是傷害我們國家的主角，但當年傷害我們國家的，並不只謝偉思一人，他們至今並未認錯，並且還在美國文化界言論界上倚賴同志組織伺機活動。

(三)美亞事件雖然只是中美關係中的悲劇，但今天應該切取教訓的，決不限于中美兩國。泰越南韓菲日，凡屬自由世界與美國友好的國家，都應該引此為前車之鑒。現在世局異常動盪，自由世界的秤砣，已經漸漸轉向，如果自由世界不記此教訓，則將來還有類似謝偉思的事件發生。

歷史不必重演，而人事的錯誤却會再見！

趙惠謨先生：

美亞文件應縮減在美印行

我應對美國使領加強聯繫

主席、各位先生，剛才聽到雷先生報告「美亞報告」發表前後的事實經過和梁先生報告關於「美亞報告」國際背景的分析，可以說今天的座談會到此已收穫很大，尤其梁先生過去在美國看到許多歷史文件，這是我們所無法獲得的資料，今天由梁先生指出來，我個人非常感謝。當抗日戰爭時，我在我國駐英國大使館服務，國內的情況不十分清楚，現在在國內又看不到當時有關文件。剛才兩位先生都提到，美亞報告發表後，我們應如何就此事作為後車之鑑，提高今後之警覺，實為當前之急務。現在本人就剛才雷先生和梁先生最後的結論所提到的，再提出本人的意見，供諸位先生參考。

我想各位先生總會留心我們中央社三月一日來自華盛頓發出的電報，其中談到關於美亞報告到目前為止，在美國尚少報導，這期間已經過了半個月。而柯貝克教授在序文中的論斷，提出兩點說：「當時美國政府改變對華政策，不支持國民政府，是犯了悲慘的錯誤」。這不僅是我們悲慘，美國參加韓戰、越戰，死傷幾十萬人，而今天尼克森總統還弄得焦頭爛額，毫無辦法，這也是美國悲慘錯誤的下場。另一點說到：「當時美國少數駐華低級外交官員，應負造成此項錯誤的責任」。這一點我認為，假如完全把這一責任加諸美國低級外交官員，正如剛才梁先生所說，未免過重；然而那幾位外交官作了共匪和國際共黨的工具，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所以本人就個人所見，對美亞報告提供兩點意見。

第一、美亞報告發表以後，我們在美國，應該做些什麼工作；第二、美亞文件發表以後，我們在國內，此時此地應該作些什麼事情。第一點，根據中央社的電報，知道美亞報告儘管由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國內安全小組正式發佈以後，對美國的國務院很不利，對美國左傾報紙也不利，但這樣兩大冊的書，要美國一般老百姓來看，我想是絕無可能的，在座的各位先生，有曾經到過美國的，尤其梁先生在美國多年一定都知道，美國的一般報紙

，其中關於國際新聞究竟佔多少篇幅？這並不像我們中國，任何報紙至少有一版或半版是國際新聞；而美國的地方報，要找幾條國際新聞是很難很難的，除了與美國最有關係的一條二條外都是地方新聞，過去美國國務院邀請我去訪問時，在二個月中，我到達各地方時，總是找當地報紙看，除了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外，要看一般國際新聞是很難找的。我們希望美亞報告發表後，美國一般人能够知道自己所犯的錯誤，是極爲困難的。所以今天本人建議，我們用什麼好的方法，把兩大冊美亞報告加以精縮。各位都知道，單就美亞報告的序文而言，中國時報翻譯出來的序文，就有約十萬字之多，我們國內究竟有多少人曾加以細讀，這是個事實問題。所以我們現在，如何先把美亞報告的序文精縮，再把三百一十五種文件中，找出最有關係的，美國人看了最動心觸目的，找出幾件原文，印成一本小冊子。這一小冊子如何印法呢？是由我們的大使館，我們的新聞處，自由太平洋協會，出名印行？都不妥當。幸好最近美國廿六個反共團體成立了美國支持世界自由協會。假定我們要促成這本小冊子之普遍流行，這個團體至少比我們中國人出面印行要來得好，比美國任何與我國顯有密切關係的團體替我們出版，也來得有用處。所以我們今天在美國，首先要將美亞報告加以精減，編成一本小冊子，並請由美國支持世界自由協會印行流傳，使美亞報告在美國人中至少在美國知識份子中，發生作用，使他們瞭解美亞報告是前車之覆，現在應避免重蹈覆轍，不再與共匪妥協上當。

第二、正如剛才雷先生和梁先生報告，我們應承認，這些低級外交官，如戴維斯、謝偉思兩位是主要人物，另外還有遠東司長范宣德，都是匪共及國際共黨的工具，但到今天還沒有人能證明，這三個人是共產黨，然而爲什麼他們願意替共產黨工作呢？這就是說，這三個人當時並不是我們完全不能爭取，至少不是我們不能相當加以防阻的。我們要瞭解在美國大使館的政治工作人員，我們是要盡可能加以爭取的。在最近二十年來，我們美國大使館高層人員中，與我們最友好的，是過去藍欽大使和莊萊德大使，可是這種事情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我們總得加以努力，過去的萊格爾副館長到現在對我們還是很好。最近走了的政治參事丁大維，回國後還寫信來表示對我國友好。這就是說，我們在此時此地，如何使美國大使館中，現在負責政治責任的人員，使他們瞭解我們的真實情況，使他們瞭解中華民國的利益與美國的利益

益休戚相關，讓他們站在中美兩國共同利益的立場，來作報告。若單要他們替中國說話，那怎能辦到呢？人是有感情的，所我們先以中美兩國的利益作前提，再加以個人的交往研談。譬如我們立法院外交委員會方面，由若干委員自己出面，請一個茶會，請美國大使館政治參事、副館長等人，聚集在一起開個座談會，一方面可非正式地交換意見，另一方面可以聯絡感情。如果我國方面老是不與美方人員來往接觸，意見固無從交換，感情更是有段距離。只有大家經常接觸站在共同的利益立場上，那麼美國方面對於我國的主張與要求是比較容易接受的。至於這件連繫的工作應由那個單位來主持，我認爲中央黨部第四組應當負起這一責任，另外如國際關係研究所、中美文化協會、美國留學生會，及凡是與美國有關係的團體，都要用種種的方法，使美國方面的人士瞭解我們兩國的共同利益，由建立人與人間的情感，進到國與國的感情，對於有成見的姑息份子，則加以適當防阻，務使類似美亞報告之事不再發生。我們在反攻大陸之前，所面臨的處境，可能比當時對日抗戰還要艱苦，還要危難，所以今天本人提出這兩點意見，請教各位先生。

張文蔚先生：

設法向美國學術團體爭取朋友

對我在美學人留學生應多照應

我有個主要的原因故想表示點意見。我今天是抱着學習的態度故獲益不少，同時因爲我年輕，懂得又不多，如現在不講，等一下恐怕都被別人講去，那麼我今天的出席此會，感覺就不同了。前面各位所發表的意見，和我這幾天所想到的都差不多，不過我想強調幾點。第一點，在戰時，外交情報非常重要，平時一個民主國家，人民可透過輿論，發表意見，一般知識份子和外交專家都有討論的機會，但是當軍事與外交配合下，政策必須立刻決定時，情報極爲重要。同時我們發現，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在二次大戰時，手中持有的情報很多。在東京有一個情報網，經常給史達林提供寶貴的情報，所以史達林能在希特勒被打倒以後，在西伯利亞按兵不動，這是在避免犧牲

這時史達林知道他能夠以較少的犧牲而獲得更大的收穫，所以在原子彈轟炸日本二天之後，他一定要出兵中國東北和北韓，這對他是一個很大的利益，甚至於史達林也出兵，把蘇聯部隊投入日本，可是美國在這時改變了政策，阻止了蘇軍進入日本而為佔領國之一的機會，這一點也可以說是美國在亡羊補牢過程中的機智。在戰時情報發展過程中，還有一例子值得注意的，就是我有次看到一本書，是美國加州大學教授Prof. Chalmers Johnson寫的，他在書中表示出一點，使我感到很詫異，就是在原子彈尚未出現以前，美國如要向日本進軍，至少有五十萬美軍要死亡於進軍日本過程中，那麼在這時，要先轟炸日本，如何轟炸呢？利用那一處基地呢？那時就想到共匪游擊隊盤據地區的中國沿海一帶，這就是告訴我們，美國很早就有可能與共匪取得聯絡的，我們重慶國民政府可能對游擊部隊未加注意，而美國則對共黨游擊部隊頗為注意。從這些例子可以告訴我們，戰時情報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一個民主國家，其外交政策的決定，往往有人民的意見參入其中，所以民主國家一定要輿論配合國家利益，在此過程中，我國是美亞雜誌的攻擊對象。所以我的話非常沉痛，許多想講的，我也不願意多講。有一個問題我想提出答復，就是為什麼這六個人，沒有受到美國當局的嚴重處分。剛才也有幾位先生提出，只是沒有充分討論，對這一點我有兩點意見：第一，因為這些人不是政策的決定者，只是提供意見，影響了政策的決定者，當時政策決定者是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等人，所以這六個人，沒有受到美國公共輿論的打擊和刺激；第二，這六個人是透過拉鐵摩爾和披上太平洋學會的外衣，以學術機構的立場，使他們有一個逃脫責任的機會，所以我們對美國學術界對華的認識和觀感應倍加注意，如何能爭取美國學術團體對我們有進一步的認識，我想這兩點很重要。美國政府本身是誠實可靠的。

我們如何來做亡羊補牢的工作呢？我想我們中國人有足夠的聰明智慧，我們在台灣的人口也不算少，拿我們今天辦外交的成績和以色列辦外交的成績相比，我是非常佩服以色列辦外交的人員。他們的人數不多，但是他們能左右世界很多地方的輿論，尤其他們對美國政治的本身能發生那麼強有力的作用。例如在二年前，羅勃甘迺迺尚未遇刺之前，他盡量要美國自遠東撤兵，但是在電視中和麥加錫參議員辯論時，他自己也堅持美國一定要幫助以色列，在這一方面，甘迺迺是不敢妥協的。還有一點是以色列外交的成功之處，

就是杜魯門總統在聯合國剛好把巴勒斯坦分成兩塊時，杜魯門馬上承認以色列是個獨立自由的國家，這對以色列未來的命運和自由世界對以色列的態度，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以色列這一國家是四面楚歌，但是因為以色列人有組織，智慧高，善於利用種種方法來影響世界各地的輿論，所以還可以不斷地增加其生存奮鬥的力量，我想這個例子很可以供我們學習的，至於我們向以色列學習時，我們的途徑和工具是什麼呢？這是值得考慮的。例如以色列在美國經濟方面的人才很多，紐約市有很多猶太人，所以紐約選出的參眾議員，不能不對以色列採取比較友善的政策，國會議員中，猶太人也不少，高級政府首長也不乏猶太人，這是我們所缺乏的條件，那麼我們的工具到底是什麼呢？我想我們應該設法向美國學術團體中去爭取朋友，很重要的對象，就是東方問題專家，尤其是中國問題的專家，在最近半年來，對美國遠東政策的轉變，始終沒有講太多的話，我的意思是，這些人認為，可能尼克森政策轉變中，有很危險的地方，或這些人，對美國現在某些自由份子的錯誤可能感到非常失望，但是不願講話，除非有很多人支持，他們才願意公開挺身而出，仗義直言，這些遠東問題專家都是我們說服爭取的對象。另外的辦法就是我們的僑民。以色列的僑民在世界各地，無不替以色列出力的，他們出錢或以各種方法影響公共輿論，我在美國十年教書過程中，知道每一個以色列的學生，一定是替自己的國家講話，而且他們的知識很豐富，講的話都很有力量，使聽者不能不覺得是個愛國份子。可是我們中國在美國的留學生，大部份是學理工的，一提到政治，就不願意去談它，而且他們的父親告訴他們到美國去讀理工，不要談政治，而且他們對政治也的確不懂。我們幾個在美國學社會科學的人，在美國也被國內所放棄而不加理會，所得到的只是一份中央日報，實際上也沒有什麼資料的，所以我國對在外留學生缺少聯繫，學生也缺少聯繫。例如我們國內提倡文化復興，可是在美國的中國人，對文化復興並沒有什麼作為加以表現，好在在紐約最近有薛光前博士和梁和鈞教授等，開始在紐約設立一個「文會」，否則簡直找不到任何東西，所以我覺得，我們對海外的自己人都沒有進軍，那麼我們又如何去影響美國人的情緒和理解，尤其對將來，尼克森政策轉變過程中，又怎樣去影響呢？所以我希望各位在座的學者、前輩、教授，多加考慮，使得我們政府在這一方面多加注意。

谷正鼎先生：

對姑息主義的宣傳力予駁斥

對美國錯誤政策應據理力爭

主席、各位先生，剛才諸位對美亞文件的分析已經很詳盡了，尤其雷先生和梁先生說得更為詳細，對文件的本身，我沒有什麼分析，我僅在這一文件中，提供幾點教訓，作為我們採取行動的方針，我們中國有一句話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美亞文件的教訓，對中國重要，對美國尤為重要。在美亞報告文件當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破壞中美關係以改變美國對華政策，乃是國際共黨滲透的陰謀。從美亞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出，當時高斯大使的報告，與赫爾利大使的報告，都主張繼續援助國民政府，支持國民政府，可以說他們完全執行美國的政策。但是使我非常驚異的，為什麼大使的報告不被採用，而幾個低級親共的職業外交官的報告反被採用，這就是共黨組織在美國各級機構都有滲透組織的結果，不僅在美國駐華大使館內有滲透，而且在國務院，在羅斯福總統左右都有滲透，所以彼此呼應整個的有計劃的來實施破壞中華民國的陰謀，不僅能報告，而且能左右美國政府，這一點我們不能不警惕，尤其是要喚起美國朋友的注意防範。至於有的人說，當時我們本身有很多弱點，給人以攻擊的口實。當然，一個國家在長期艱苦抗戰獨抗強敵的當中，難免會發生弱點，而美國本身也有弱點。但是對弱點所抱的態度和看法與立場如何，共黨與一般人是不同的。凡是同情我們的反共人士，看到我們的弱點時並不以為是弱點而加以攻擊，只是對我們提出同情諒解的忠言與勸告，並不以我們的弱點作為反對我們的口實，所以凡是反共的人或非共的人，看到亞洲反共的國家，只有寄予同情與援助，不會謾罵和批評；至於共產黨和共黨的潛伏份子與同路人，無論你是多麼好的國家，只要是他們心目中的敵人和顛覆對象，它總是千方百計來造謠污蔑，反之，共黨份子對罪大惡極的共黨統治却加以血脈、無恥的宣揚。柯貝克教授在序文中說：「在二次大戰期間，美國政府支持國民政府之政策，被一些駐在中國的美國

人員從中作梗，並加破壞。」「韓國和越南的悲慘戰爭，均直接由於共黨奪取亞洲心臟地區所造成的。而遠東其他地區過去二十年一再發生騷動，其主要禍根在中國大局之糜爛。」今當美匪華沙談判之時，我們希望尼克森政府不要再蹈覆轍。我常驚異，何以少數潛伏於美國駐華大使館與國務院的共黨份子竟能破壞美國的對華政策，而負最高決策的國務卿與總統竟受其愚弄，我深懷疑美國當局的智慧與責任感。羅斯福、杜魯門、馬歇爾、艾奇遜等，對華政策錯誤，導致大陸淪陷匪手，因而韓戰越戰隨之發生，美軍傷亡近三十萬，是拿美國子弟的血來補償他們的錯誤。所以我們今天要喚起尼克森政府注意，如果再不從美亞文件中得取教訓，將來美國人恐怕更要流大量的血，而這些血恐怕不是在歐洲，也不是在亞洲，而恐怕是在美國本土去流，而美國本身的自由亦將受危害。今天美國有一點很值得我們警惕的，就是今天美國司法的左傾，而羅吉斯國務卿對共匪陰謀認識不清，易為共黨所利用。和杜勒斯時代不能比，和魯斯克時代也不能比，所以在這種司法左傾，國務院愚昧的時候，對共黨的滲透陰謀我們更應提高警覺。從前美國有人認為毛匪澤東是民主的土地改革者，而加以扶持，結果犧牲了整個中國大陸；後來又說卡斯基是個人土地改革者，結果斷送了古巴；今天美國的姑息份子傅爾布來特及費正清輩又在攻擊越南總統阮文紹，要強迫越南與越共組織聯合政府，同時又說毛匪政權是中國文化的代表，他們忽視中國大陸人民反共的英勇及毛匪搖搖欲墜的事實，而硬說毛匪政權能够控制中國大陸，這些論調，和當年說毛匪澤東是土地改革者，是具有同樣的毒素，都是共產黨人唱出來的口號，中美人士不能不加警惕的，尤其不能不提醒美國人警覺。所以美亞文件的重要性，不僅在我們國內，而這一文件的宣傳重點，要擺在美國，要使美國人看到這一文件，能有所覺悟，不要再上共黨的當。我們知道，美國人最容易被共黨利用的，就是美國人把共產黨也看作是「人」，殊不知一個人受了共產黨訓練以後，根本就不是一個人，和普通一般人的觀念就不相同，用自由世界的「人」的觀念去對待共黨，一定會吃虧上當的。同時美國人拿了「美式民主」，不顧客觀環境到世界各地去推行，而共產黨就利用此點來離間美國與友邦的關係，破壞彼此間的友誼。亞洲國家與美國國情不同，故其實行民主的方式亦異。歐洲各國的民主制度與美國亦不盡相同。目前在亞洲首先要安定才能建設民主。因為安定是防共的武器，混亂是共產的溫床。美國應嚴防其駐

外機構中的共黨潛伏份子，在友邦內部製造分裂運動與搞政變，圖利共黨，致為共黨所乘。美國為自由世界的領導者，共黨就集中力量在精神上腐蝕美國，所以現在對共產黨的思想的主戰場，不在亞洲，也不在歐洲，而是在美國，這不僅是我們中國應當注意，而且我們要呼籲亞洲的國家共同努力，要在美國這一思想戰場上，去對國際共黨和姑息主義者作戰，以挽救美國的精華危機。我們要知道，今天費正清這批人以及范宣德等，在為共匪服務，在製造台獨運動，以企圖動搖反共復國的基地。他們歪曲中國的史實，甚至於說毛匪澤東是中國文化的代表者，這類荒謬論調，如果讓它流行下去，那麼所有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人，大都是費正清的徒子徒孫，將來都個個成為姑息主義者。為什麼美國外交官中，有左傾和同情共產黨的人呢？其根源就在於此。所以對於費正清的理论，我們中華民國的學者和黨政機關無旁貸，應該負責加以駁斥，他出版一本書，我們則也出版一本書針對它加以駁斥，他寫一篇文章，我們也就寫一篇文章加以駁斥，這種駁斥應當在美國及國際間推廣。今後對美國的外交態度，我們不能用打太極拳的辦法和黃老哲學去隱忍退讓，無論我們的政府和民間，凡是有關我們國家的利益，有關中美的共同利益，有關自由世界的利益之處，應說的就應該說，應該反對的就反對，縱然美國人不願意聽的，我們也應該說，以這種態度，才能免除以後的災難。我們須知，姑息主義是共黨的先鋒，要反對共黨，必須首先反對姑息主義。我們要維持中美的友誼，必須對姑息主義的宣傳力予駁斥。對美國政府的錯誤政策，我們應據理力爭，力求改正。如遇類似白皮書的文件，我們應當提出我們的相對文件公諸於衆，訴諸於美國的民衆，訴諸於全世界的輿論，我們不可默爾而息唾面自乾。以其事後無法補救，不如力爭於事先。我們要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來揭破共黨及姑息主義者破壞中美關係的陰謀。自由世界實利賴之。

鈕先銘先生：

戰時美國幾種錯覺造成惡果

俄雖曾助我目的在爭取利益

「美亞文件」座談會

本人是軍人出身，當美亞雜誌發行期間，正在軍隊中服務，就當時所見有關軍事方面，作一個簡要的說明。在抗戰初期，俄國是首先幫助我們的國家，這一點在亞美報告的序言中也說得很清楚，那時蘇俄根本就不知道我國是否能真正和日本作戰到底，因為如果中國真能和日本作戰到底，則不僅削弱了中國中央政府的力量，使共產黨可以坐大，同時從日俄戰爭後，這樣強大的一個日本勢力，能在中國消磨其實力，那麼俄國在東方就沒有後顧之憂。自從民國廿七年，大鵬灣登陸之後，以及到了民國廿七年底，武漢撤退到重慶期間，中國再也沒有和日本講和的可能，從那時起蘇俄對我們的援助就慢慢鬆懈下去，所以在初期，蘇俄的目的在逼使我國和日本打下去；在中期中蘇俄對我們的援助鬆懈下來，其原因是中日戰爭一定會繼續打下去，那麼中日兩國兩敗俱傷，實力大為消耗，那麼俄國就可幫助共匪，在我國東北、西北以及黃河以北的地區，漸漸坐大；在戰後，史達林執政時期，在一九四〇年以前，他不知道美日會啓開戰端，更沒有預料到，戰爭會如此迅速地結束，所以到了戰後，共匪力量尚未坐大之時，蘇俄就利用美國來牽制我們中央政府，以便使共匪能更加擴大其力量，達到奪取政權的目的。在這段期間，有一件重要事情發生，那就是「三人小組」以及「軍調部」的成立，本人當時是「軍調處」我國政府的副參謀長，關於這一方面的經過，剛才朱少先先生希望我寫一篇文章加以說明，我想這篇文章很長，暫時也不便在此向各位報告，待我撰寫以後，再求教於各位先生。

在太平洋開戰之後，美國當然希望在海空軍方面，能制止日本的軍事行動。但日本雖然是一個海洋國家，而陸軍却也非常強大，就沖繩戰爭當中，美軍傷亡約七萬人，可見島國日本，在海空戰中，竟然使美國的傷亡那麼龐大，也可知道，日本是個海洋性國家中，兼具強大陸軍的國家，因此美國也在爭取中國，牽制日本卅個師團的軍力，約一百萬部隊在中國的領土上。由於美國急於希望戰爭早日結束，日本從中途島之役後，已漸漸走向下坡，但是從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五至十九號之後，直到戰爭結束為止，中間拖了約三年到四年之久，因此美國曾積極謀求戰爭之早日結束，為求戰爭之早日結束，美國希望除了我國中央政府的力量以外，能否在北方，尤其沿海的地區，產生第二個力量，來幫助美國，這就是當時美國的錯覺，希望利用共匪力量的原因之一。當時胡宗南部隊正包圍在延安附近，美國認為，這是中國人自己

在消耗自己的力量，未能充分使用這一龐大的民衆力量來抵抗日本，這當然是美國的錯覺。

戰後，美國的外交政策趨於重歐輕亞，即使在亞洲，也是重日輕中，所以對於這種錯覺，其後果相當的嚴重，正如前面幾位先生的發言指出，美亞雜誌的六個人並非共產黨，而其在外交官的地位，也不過是二等和三等祕書，所辦的雜誌也不過發行一千七百本的消售量，他們在雜誌社擔任編輯的責任。所以這件事情雖然很重要，而他們的地位却非常低，主要是表示，美國在執行政策期間，受到這樣嚴重的包圍而發生了如此重大的後果，至今美國當應自食其果。

今後在尼克森主義下，是否會重演美亞事件的悲劇，也就是剛才幾位教授，谷委員和趙委員所說的，應當有很多的處理。我因為是個軍人，站在軍事的立場上，作上述說明。至於有關「三人小組」的事，我另外寫一篇專文，就教各位先生。

余紀忠先生：

美亞文件是對白皮書的答覆

發表此文在使中外有所警惕

我們發佈美亞文件的新聞，當時的觀感，現在簡單地向各位略加說明。我記得二十年前在白皮書發表之時，凡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心頭都感覺非常沉重，至今回想起來，記憶猶新。總裁曾經寫了一句話：「寒天飲冰水，點點在心頭」，我想這句話，大家必然銘記在心。這二十年來，一直沒有一個機會，能够作有效的答覆，看到了美亞文件之後，我們多少喘了一口氣，這是美國的歷史學者、美國的國會所撰寫而發表的，所以無形中，把抗戰的責任和戰後美國的誤解和錯誤的各種情形，可以從他們的筆，把他們的歷史，重新加以改正。另外對於我們在今日的台灣，對本省的同胞來說，恐怕也不太瞭解抗戰期間的艱難和過程，這種不瞭解和錯誤的解釋情形，今後可以給我們一個澄清，對我們的子弟也是一個很好的教育，其意義非常深長。此外還有一點作用，也就是剛才各位先生也都講過的，在今天我們主要的盟邦

美國，瀰漫着和平和失敗氣氛，漸漸由和平而接近失敗的邊緣，這一情勢下，我們看到這一文件，對於滲透在美國各界上下層的共黨同路人，有所戒懼，同時真真爲匪張目的人，也因為這個關係，將來即使繼續做出有害於我們的事，也減少了其實際的效用，同時也提高了我們以及國際間的警惕，我覺得這也是很有意義的事，因此我們提供了美亞文件給各界參考，除了發表序言外，完全以成本印刷，以便廣爲流傳。我們供應軍人讀書者，僅收每冊二元二角，還不够紙張的成本，供應一般外界讀者的，僅收五元一本，僅够成本，我將這一點向各位報告，以示我們新聞從業人員，對國家貢獻一點小小的力量。

石永貴先生：

我應把美亞文件重要內容

供給與我有關的反共國家

主席、各位先生：今天在座的各位先生，都是對於中美外交有研究的學者專家，我願意以後學的身份，聆聽各位先生高見之餘，並以我的不成熟的意見，趁此機會向各位學者專家請教。

美亞文件的發表，我適在國外，三月四日，當我回到國內，才知道。美亞報告是中國災難的線索，世界禍患的根源，這是一份值得世人警惕的歷史，但引爲憂慮的，這份報告在國外的報章雜誌，包括香港在內，並未獲得應有的重視。

就序文所揭發出來的事實，美亞報告中的人物及史實（除了美亞雜誌的六個嫌疑犯外），均是我们所熟知的。

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爲什麼此時發表這些文件，據我個人所接觸到的資料看來，似並無特別的意義，同爲美國國務院及參議院，經常把一些失去時效的文件，經過整理研讀後發表出來，以減輕機密的負擔。我的意見是說：美亞文件本身是否有價值，我們似不能仰賴美國，尤其不能對於發表動機作過多的推測。因爲我曾經看到若干報紙社論，說是美國此時發表美亞文件，對於姑息主義者有澄清作用。

對於美國政府及輿論界不重視美亞文件的發表，我們看到兩種解釋：第一種是並非由於報告的發表不值得報導或不值一讀，而是因為美國出版界覺得這是一件很尷尬的事，碰都不願碰它。國務院認為「美亞報告」的發表無異於自打耳光。因為國務院過去那些「中國通」，例如范宣德、謝偉思和戴維斯，均扮演污蔑中華民國政府及為共匪張目的角色。因此國務官員拒絕對這些文件公開表示意見。

第二種說法，也就是貴所副主任鄧公玄先生在「對美亞文件應有的認識與警惕」大文中所提到的：「其所以並未十分重視，或許因為這是二十多年以前的舊事，除了有有心人士而外，大家都不甚感興趣」。

我個人比較同意後者的說法。大眾傳播工作者在選擇內容的時候，選擇自己有興趣、有利益的事情，美國新聞界對此事反應之冷淡，實值得我們警惕。換言之，如果不幸該項文件之內容，如同白皮書者，如何裁誣、侮辱中國之腐化，美國報界必會大加刊載。

因此，美亞文件本身有歷史的價值，但要它發揮現實的價值，也就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萬不可靠美國政府，需要我們自己從兩方面努力：

第一、我們自己。美亞報告的發表，正是美匪華沙會談之時，美國用盡一切方法和中共建立關係。因此，美亞事件的教訓，實是我們外交的教育課本。尼克森當選總統後，我們經過一陣歡喜後，是失望，甚至最近的輿論，還帶一些抱怨。事實上，尼克森的政策，固然令我們失望，但如果其他人當選總統，可能更糟。原因很簡單，美國國內外都面臨許多問題，要解決這些問題，他們先要考慮他們自己利益。如果我們在外交方面，不能獨立自主，不能開創新局面，未來的日子，實在艱苦。因為幾年來，我和美國人接觸的結果，發現美國人對於我們中華民國有二種不利的型態：第一種是無知而又善良的鄉下人，他們對於台灣一無所知，也難怪，有少數鄉下人連麥克阿瑟是何許人都不知道，自然也不會知道我們的存在。第二種是屬於有偏見、有色素的無知的幻想者，他們認為中共偽政權之出現，是國府腐化無能之結果，對於現在及未來，認為美匪之間關係所以不能改善，中華民國政府是主要的絆腳石。他們夢幻解決台灣問題有兩種方式，一是透過談判，事實上華沙會談已經進行了一百多次，越來美國讓步越多，一是所謂台灣獨立運動。

把我們的政權弄垮，使我們不存在，中華民國的問題就解決了。

具體而言，自從一九六〇年以來，年青的美國人，在政治方面佔有相當的影響力，無論在候選與選舉方面，而越年青的，對於我們的地位，也就越淡薄與輕視，我以為這是我們應該引以為戒的。

因此，我們要想美亞文件本身在美國有價值，必須從教育著手，使得研究「遠東政府」的人，知道這段史實，對於我們有新的評價，新的瞭解。我以為如何在「遠東政府」這門課中，發生作用，是考慮美亞文件本身之價值，應該要做到的，以免讓費正清及其門徒的教科書，參考資料，繼續錯誤下去。

第二、反共是世界性的，世界任何地區反共力量之增長，均是直接、間接有助於我們力量的成長。我們應以適當的途徑，把美亞文件最重要的內容，供給與我有密切關係的反共國家，這樣，在消極方面，使它們提高警覺，在積極方面，增進對我真正之瞭解。

總之，我以為「不經一事，不長一智」，美亞事件對於我們自己的經驗教訓，應該勝過對於美國。

陳紹賢先生：

美對中國問題模稜兩可

防微杜漸我應早做決策

最近我接觸到的一些年輕朋友，都談起美亞文件的問題，他們都感覺到，這一文件的發表，使他們知道了許多尚未知道的史實，這一點我也有同感。就是現在五十歲左右的人，大都也只認為，當時共黨同路人從事顛覆我國政府的，只是少數美國的中下級外交官員，如范宣德、謝偉思、戴維斯等而已。這文件發表了，才使得大家都瞭解，那是一個國際共黨的大陰謀。所以這兩厚冊文件的政治教育意義，在我們中國的青年來看，是相當重大的。

這一文件顯示出，由國際共黨所策動顛覆我們政府的陰謀，美國各方面受他們利用的份子，相當廣大和複雜。但是我們從另一方面看，像柯貝克教授在序文中所提到的，我們也可了解當時也有同情和了解我們的人。在高斯

、赫爾利和魏德邁之外，像羅斯福總統，一開始就是同情我們，支持我們的。一九四三年十一月、十二月間，他先後在開羅和德黑蘭時，他對中國的政策，分別取得了邱吉爾和史達林的了解。當他逝世之前兩星期，他曾派赫爾利去看邱吉爾和史達林，和他們商量修改雅爾達秘密協定，而不獲結果。

在美亞事件發生後，杜魯門總統也曾很精明。司法部對各涉嫌犯的處理，起初預備組織大陪審團來審理，後來於決定要提起公訴之後，該部刑事處忽宣告關連美亞雜誌社的起訴行動必須延緩，以待聯合國成立會議有了結果。其理由是說，如果在那時起訴，可能引起蘇俄反對聯合國的成立。這種理由可以說是非常幼稚的。代理國務卿格魯和助理國務卿何美士爲了此事，去報告杜魯門總統。他立即給聯邦調查局的古尼亞通了電話，令他馬上提起公訴。可見杜魯門當時對共諜嫌疑案是不馬虎的。再說，杜勒斯國務卿，他對於親共份子，絕不姑息。就對謝偉思的案來說，依國務院的規章處理，須由副國務卿根據院內一個局的調查結果，正式提出免職的建議，國務卿方得以安全理由予以免職。但是杜勒斯不經這一程序，立予免職。儘管此案後來諸多變化，但杜氏此一行動，也表明了當時在華府的上級官員中不乏明智之士，厭惡共諜在美國內外施展陰謀。

我們感覺到，談這一問題，固然當時我國所處的環境很壞，國際共諜在美國朝野中造成一種普遍的錯覺，認爲共匪是個土地改革派，而我們的國民政府是個無能的政府，非予以推翻不可，美亞報告的「序文」中也提及，一九四九年以前十多年當中，美國著名出版商有二十多部書籍都是報導中國共

主席結論

合。

各位先生，現在時間已經到了，今天各位發言非常熱烈，見解也都很精闢，現本人就各位意見做一綜

產主義；同情我們的却不到十部。在一九四五至五零年之間，六個所謂「中國通」簽署了一百六十種意見，其中替共匪說話和宣傳的，爲什麼我們沒有有力的反駁文字呢？所以我們的確需要反省。

鑑往知來，我們看今天的情形，「台獨」在美國的活動，這能說不是以共諜作背景的組織在策動嗎？事實很明顯的，他們現在要推翻我們，不是爲扶植共匪了，而是要扶植另外一個組織，即所謂台灣獨立運動。雖然做法不同，目的是前後一致的。這是我們必須警惕的。

我們看看最近尼克森總統的政策，簡而言之，從他二月十八日發表的文件的看來，對中國的問題，還是模稜兩可的，還是可東可西的。那麼，在這個時候，就要看我們的反應和做法了。我們不能不切實檢討，重新有所決策。最近有件事實，還值得我們可慮的，就是上星期五，美國國務院通知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說，對於參議員馬西亞斯取得曼斯斐特等支持的提案，政府不加倡議，也不反對了。該案是提議廢止國會授權政府的對外承諾案，即一九六四年的東京灣案、一九五五年的台海協防案，以及關於中東和古巴兩案。如果這提案通過的話，尼克森政府屢次對我們表明，尊重對中華民國的承諾，那麼，除了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的承諾外，其過去對於金馬的承諾，就可能成問題了。當然，我們今天的地位，誰都出賣不了的。不過等到那危機發生時，我們才來謀求挽救，那就恐怕來不及了。所以防微杜漸，我們需要早作決策。

一、由於「美亞文件」現在發表，無異揭發了二次世界大戰期中，在一九四三年莫斯科宣佈解散共產國際之後的一個大陰謀。就是國際共產黨要在亞洲製造一個紅色的中國，加上一個紅色的日本，作爲赤化亞洲與包圍美國的主力。因此利用了一批美國低級外交官、新聞記者、以及所謂「中國通」，以國務院與美亞雜誌等機構的合法地位，掩護他們的非法活動，諸如覬覦中國政府與領袖，離間中美關係，並爲共匪張目，指匪爲土地改革者，爲毛共的叛亂竊國鋪路。因而美亞雜誌等乃能竊取美國政府大批高度機密文件，從事各種非法活動，而事後竟予不起訴處分。此一歷史事實值得我們研究和重視。

二、由於美亞文件之發表，可知中國大陸之淪陷，以及今日亞洲及世界局勢混亂的主要責任之所在。即美國當時未能深察共產國際的陰謀，改變了對華政策，而有今日人類之災難，共產國際之手段是惡毒陰狠的，而其陰謀更是異常深遠，民主國家疏於防範，是值得記取的一個教訓。

三、如果說二次大戰期中是國際共黨出主意，美國服從，致造成今天的悲慘局面，那麼今天是否仍有同樣情事而不接受歷史教訓，以致將造成更大的災難呢？美國值得注意，我們也應警覺。中美兩國應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努力，防止共黨的滲透顛覆活動。若美國朝野仍不注意，則今日的錯誤不僅是美國，甚至所有的民主國家均將遭受危害。

四、由美亞文件中，我們深知外交情報非常重要，尤其在戰時，一個國家對重大事件需要立即做決策時，更有賴於正確與迅速的外交情報。同時民主國家如何能使學術界與輿論能配合國家的利益，亦極重要。

五、「美亞文件」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文件，自由世界需要反省檢討，但要它能發生現實的作用，更需要我們本身的努力，在外交上要本獨立自主的精神，協調盟邦，開創新局面；更要加強我們內部的教育與對外的的工作，特別是學術界、與論界的聯繫與合作。

今天承各位專家學者前來參加討論，本人特別代表本所向各位致謝。

論美國現階段的越南政策

陳紹賢

一 政策重心在移轉中

去年二月，尼克森就任總統之後，迭次聲明，謀求和平解決越戰，為其施政的第一優先，直至今年二月十八日，他向國會提出「一九七零年代美國對外政策」報告書（簡稱「世局咨文」），又於開端就說：「當我就職時，我國面臨的最迫近問題，就是在越南的戰爭。在過去一年中，沒有問題比它

佔據了我們更多的思想和精力。」

儘管迄今越南問題仍佔美國對內對外政策的第一地位，但一年來它的越南政策在演變中，而其重心由「談判解決」移向「越南化」了。

尼氏就職之初，循前任的舊轍，力求巴黎談判有所進展，尤其是注重於尋求雙方協議撤軍，去達成戰爭的和平解決。到了五月十四日，他宣告越南和平八點計劃，其前列五點都是關於撤軍的建議：一、當達成雙方協議，所